

✓ 6208

太湖文史資料室



太湖文史資料



目 录

- 回忆太湖白沙中学的点滴情况 肖 茶(1)
太湖中学的变迁 太中党支部、校长办公室(1 1)
朱克诚与熙湖单级师范学堂 朱家托(1 3)
熙湖小学概况 罗 喻(1 9)
曹镜清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 李月霞(2 3)
- 六代翰墨一代英豪 赵荆华(2 7)
四代粉墨一门管弦 张文鹏(3 3)
活跃在大别山区的太湖县抗建剧团 张文鹏(4 1)
- 解放前太湖县的青年运动及团组织 余维和(4 3)
石光明同志在太、宿地区的革命活动片断
 和牺牲经过 曹鸿骞(5 3)
回顾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太湖县
 财政工作 王镇国 石必如(5 7)
太湖县司法科建立始末 李敬勋(6 4)

南斗冲三次事变始末	甘德根(68)
日寇飞机坠毁 荆竹群众遭殃	吴周明 赵荆华(73)
日寇飞机轰炸徐桥镇罪行见闻	阳朝阶 王受年(76)
我的一点回忆	张 霞(78)
汪万顺药店创业史	汪世琳(81)
李振钧的家世及生平	甘德根(89)
王大枢	王玉祥(97)
唐宣宗为何来太湖一游	熊旌旗(100)
青城县旧址——上格城	王玉祥(102)
佛图山佛图寺	张太成(104)
征集文史资料稿约	(106)
《太湖文史资料》第一辑勘误表	(108)

回忆太湖白沙中学的点滴情况

肖 茶

私立太湖县白沙中学，创办于1944年的秋天。

当时的安庆地区，桐城教育比较普及，由于社会办学成风，全县公私立中学达40余所，而太湖呢？教育非常落后，抗战期间，仅有从安庆迁来的六邑联立中学及省立太湖师范，这两校的招生范围，是面向安庆地区，而本县小学生进中学，确很困难。大批农民子弟无法跨中学的大门。群众都迫切希望太湖县有自己办的学校，以方便农民子弟入学。

另一方面，我们熟悉的不少进步朋友，向往共产党，向往延安，但在国统区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常遭受国民党政治迫害，如特务盯梢、逮捕、恐吓信甚至打黑枪等等，我们有两个朋友就是这样悲惨地牺牲了！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怎能按自己的意志去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我们多次考虑，决心自己来倡办学校，组织好一批进步朋友任教师，来教育一代青年学子，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决心在靠近日伪统治的前沿地带——太湖，办一所进步的乡村中学——白沙中学，来实践我们的教育理想。更决心突破国统区的奴化教育，按我们自己的理想来办学。当时国统区的教育政策，正如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一篇社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中所指出的：国民党教育行政当局是“忙于当官发财，忙于如何强迫教员、学生‘入党、入团’，如何防止异党活动，如何禁止学生自由

阅读课外书报等等……于是可怜的学生们不独在物质生活上受着煎迫，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受到苛刻的压制”。

当然，我们要在国统区的严酷压制下闯一条新路，要在深沉的教育死潭中激起几朵飞跃的水花，要在青年们的心田里播下希望的种子，这是既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是要经历一番风险的。

白手经营 沙里淘金

一个事业的创始，起步总是艰难的。

1944年的夏天，何仲衡（何鹏）和两个学生暑期在白沙畈自学时，多方向有关人宣传办学校的好处，得到了何姓族长何晓耕、何育珍、何佑朝等人的积极支持，何晓耕并在物资上支持借出“法币”一百元、米一斗、油三斤，就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了。具体筹办只有四个人，校舍是何家祠堂，“校产”用的是何姓公堂的田契。我们组织了一个校董会，聘请了省内外有声望的而又热心教育事业的老前辈（如王立民、马大浦、杨慧存、李则纲、周雨农等），向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立案，校董会董事长周雨农鼎力相助，省教育厅即批准正式招生，于八月间招收初中一年级新生三个班，计150余人，九月初即正式开学了。我校教师罗余同志曾写过一幅对联：“白手办学，艰苦创业；沙金遍地，急待陶熔。”横批是“白沙之家”。这确是当时艰苦办学的写照。

要办好学校，首先要建立一个进步的教学班子，我们办学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一批进步朋友，大力培育青年学子，真正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我们从省内外先后聘请了志同道合的年青教师近20人，我校教师的进步力量是占绝对优势的。这些教师都很年青，有理想，朝气蓬勃，关心时事，追求真

理，事业心很强，教学很认真，其中比较突出的进步教师：有共产党员赵琦，原是鄂东地区李先念部队的文教干部，在某次与国民党战斗中被俘，在押送中跳车逃亡到武汉，然后来我校任教；地下党员谢礼，一直坚持在白区工作，由于通缉而临时来我校任教；还有民先队员罗琼、梁涤非，参加反蒋民主活动的大学生蔡洲清、罗陶、王济生、王泽远等；还有从事新文化工作者向锦江、郑震、吕文载、朱山樵、陶辟、孔德、彭克修等；还有从反动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何文达、马有成、聂明等，这近20名中青年教师，都对国民党统治强烈不满，对革命满怀美好的理想与希望。我们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由于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致力教育的愿望，彼此是比较融洽，能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讨论教学革新问题，探讨新文化发展的动向，与同学之间的关系，既有严格要求，又能真诚相处，师生间交往亲密，学生们都能认真读书，家长们也很放心。白沙中学在全县很快地树立了良好的声誉。不少外县学生也闻风而来，来校读书的学生，扩及桐城、怀宁、潜山、望江、宿松、合肥等县。我们尽量照顾农民子弟的家庭困难，除交一点学费外，学生入学住宿，由自己带米带菜，每期花费不大，以减少家长的困难。

有了一批进步的教师骨干，教学逐步进行了革新，尽管我们使用的课本仍然是省教育厅的统编教材，我们却尽可能地补充新教材、新内容，如历史教学增加社会发展史，生物学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米邱林的学说，以通俗的故事形象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讲“公民”这一课，根本不用统编教材，而是讲时政知识、国内外形势，经常讲述日本鬼子残酷杀害中国人民以及敌后游击地区的艰苦斗争，并大讲苏联革命胜利后的经济文化建设等等，课堂教学比较活跃，使

青年学生开阔眼界，关心国内外大事，培养爱国热情。

除改革教学之外，还大力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②时政学习小组：经常利用报刊上的资料，从国民党污蔑我军的反面宣传中，介绍新四军、八路军的战斗的艰苦情况；日本投降后，我们大讲新四军、八路军在八年抗战中坚持团结与进步的大胜利，以及苏军解放东北的胜利进军等等；当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时，我们不时向学生们介绍会议进展情况，宣读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代表的发言，特别强调国共两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必要性。当昆明事件、校场口事件发生之后，我校部份师生真是悲愤交加，热泪奔涌！这些课外学习活动，我们明显地表达了爱憎分明的立场，对学生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当时对共产党争取民主政治、建立新中国满怀希望。

③组织进步的文艺活动。凡有关纪念节日，我们要组织一些文艺节目，对每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要详加介绍这个节日的伟大意义，要组织文艺演出。就是奉命参加三青团组织的所谓“三二九”青年节活动，我们也有意识地组织学生演唱了《在太行山上》、《吕梁山》、《游击队之歌》、《蒙古包》等革命歌曲；事后县三青团头头们扬言要追查这些歌曲的来源，我们置之不理。

④组织各种专业学习小组，如文艺学习小组、美术学习小组等等。文艺组编有各班的墙报，发表学生习作；教师也编写了两种墙报：《时事论坛》和《汇流》，经常选载《文汇报》、《世界知识》、《时代报》上的有关资料。如1946年秋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时，我校一个教师写了一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杂文，并附有漫画，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团结的阴谋，震动了全校师生。我们还广泛地向社会上宣

传了办校的宗旨及教学动态，曾在《皖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进一步获得了不少朋友及热心教育工作者的支持与赞赏。

④举办社会教育及组织学生从事社会调查和劳动等等活动。我们办了一个业余农民识字班，由教师和一部份学生进行义务教学，团结了周围的农民群众；还开辟一大片菜园，教师学生们轮流到菜地去劳动；寒暑假期间，布置部份大同学回家乡进行社会调查，收集民间谚语、故事、民歌等等，这既增长他们的社会知识，又促进他们学习民间艺术，以培育他们各方面的才能。由于我校几年来坚持教学相长的方针，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是大步向前，学生既学到了知识，也锻炼了思想。

苦心耕耘 收获在望

白沙中学设在交通闭塞而贫困的“白沙畈”，离县城有50多华里，国民党的官老爷是鞭长莫及，在抗日胜利后的短暂时间，确是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我们在教学中进行一系列的革新措施外，还办了一个学校图书馆，何鹏将个人藏书二千五百多册全部送给图书馆，又陆续添购了一部份进步书刊，通过三年的采集收购，藏书已近六千册之多。我们注意收集进步图书，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米定的《新哲学大纲》，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里昂节叶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还有《鲁迅全集》、《高尔基选集》，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的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以及周扬主编的《北方文丛》，汇编了延安的革命作品，反映苏联革命与建设的文学作品则有《夏伯阳》、《静静的顿河》、《毁灭》、《铁流》、《时间呀，

前进》、《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等。

我们冒着政治风险还从上海、香港等地订购了较多的进步报刊，如《文汇报》、《民主报》、《时代报》、《文萃》、《民主》、《周报》、《新文化》、《民主生活》、《民主与科学》、《时代》、《民主教育》、《青年知识》、《中学生》、《新少年》、《妇女生活》、《世界知识》、《经济周报》、《苏联文艺》、《文艺春秋》、《文艺复兴》等等，还与苏联大使馆进行了联系，由他们按期赠阅《莫斯科新闻》、《苏维埃评论》、《国际文学》、《新时代》四种刊物及不少成套的图片。

图书室飞交给两个可靠的进步教师管理及借阅，凡认为“红色”书刊则专架专柜陈列，有的还装在箱内，如遇到不利情况，即可隐蔽收藏。这些进步书刊的流通，既满足了青年教师们的精神食粮，更是向青年学生们传播了进步的思想和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对促进我校教师走向集体革命，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这些书刊，在我们上大别山参加革命之后，已是荡然无存了。唯一的一部《鲁迅全集》，由一个学生埋藏于地下得以幸存，但红色的封面也完全脱落了。

办校的三年，全校师生除个别坏人外，真是上下团结一致，全付精力投在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教师中的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年青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只求在教学中创出点成绩来。校长三学期不拿工资，教师也只拿生活费用，真是艰苦朴素，以苦为乐。对学生管理严格，严禁大吃大喝或赌博，大力开展自学及文娱活动，学习空气浓厚，树立了良好的校风。家长们都认为“孩子送到白沙中学读书，就很放心。”

我们在民主办学中力求逐步发展，得到了社会人士的积

极支持，很多地区都争着捐款捐校产。首先是何姓家族捐助了“义学公”田产八百多亩，其次是小池、花园、新仓以及望江的张、马、吴、叶等家族，都捐献公堂田产做校产，刘家山铺将太湖师范原校舍全部捐献给白沙中学，要求办一所分校，还捐了近三百亩林山给学校办农场。到1947年，我们增办高中部及刘羊分校，并筹建小农场。校本部也增建教室和教师宿舍，教具及图书设备也相应地增加了。教师队伍也进一步充实起来，学校在蓬蓬勃勃发展中。但是，要办好一件事业，在国统区的政治高压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是非常艰难的，在这三年中，我们也经历了几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几场搏斗 泾渭分明

白沙中学创办于国统区，是创建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当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对革命与进步人士更是虎视眈眈，采取高压政策，一片白色恐怖，我们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国民党党政头子与地方反动士绅一惯是同气相求的，在我们办校的三年中，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进行干扰。一是肆意造谣与压制。白沙中学刚刚立案时，反动士绅何衡就到处密告何鹏是共产党，是全国通缉份子，办校是一个“阴谋”，因此省教育厅不准立案，拖了三、四个月，经过我们多方周旋才批准；事后他们又到处造谣说，“白沙中学的教师来历不明”，“有异党分子”，把校长及部份教师都列入他们的黑名单，企图一网打尽。1946年春，伪省教育厅视察，伍宗儒在“视察”白沙中学之后，在太湖县城大肆污蔑：“白沙中学外来教师来路不明，讲课内容有问题。”何鹏去信伍宗儒并教育厅，说明白沙中学教师的教学态度与成绩，并说明

如有什么政治问题，本人可以身家性命担保等等。教育厅也只好不了了之。1946年10月间，县党部书记长蔡威更是亲临我校搞突然袭击，一进学校就闯入图书馆搜查，幸我们及早有了防范措施，他只抓住了《经济周报》上一篇短评的“经济民主化”而大作文章，指斥为所谓民主是“共产党的口号”。是晚还向老国民党员吴浩然（是一位在小教界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教师）探询：“何鹏是共产党员？还是民盟盟员？”吴当时打掩护说：“他是书呆子，只知读书写文，办学教书而已。”吴还多次向何鹏打招呼：“一定要多加小心，防止他人陷害。”

二是在用人方面企图插手安置他们的人员，以便于干扰学校的工作。如县党部书记长蔡威硬要推荐两个“教师”来校，我们以教师名额已满而拒绝了，省教育厅不征得我们的同意，就派来了一个“童军教练”，所谓“教练”，实际是统制学生思想的工具，我们以经费困难，无法供应两个教练的理由向厅里反映，学生们也很不满意，不到两周时间，我们好言好语硬把他“请”走了。地方劣绅何衡多次想干预学校的人事和财务，极力推荐一个总务主任，以便于他们榨取学生家长的血汗，我们也加以拒绝了。派不进来，他们就采取拉出去的手段，他们拉拢本地教师中两个老国民党员做他们的耳目，并在学校中采取所谓“洒灰”政策。1946年前后，县三青团头子马学衡、汪吼华两次来到学校，集体发展三青团员，就是按班级发表填写，并由“教练”填报所谓三青团的区分队长名单；县党部书记长蔡威也在1946年秋搜查学校图书室之后，召开了五六个老国民党员会议，成立了区分部，指定教职员中三个老国民党员为委员，建立他们的基层组织。这些反动组织成立后，也仅是徒具组织形式，从没有任

何活动。但它玷污了白沙中学的声望，以致在五十年代末期的“左”倾路线影响之下，不少青年学生受到了政治审查与处分，妨碍了他们的进步，确是非常痛心的，我们也感到内疚。

三是他们通过个别老国民党员挑动少数学生闹学潮，周围的几个劣绅更是乘机起哄，在校外叫嚣：“赶走外地人，打死何仲衡！”真是风雨交加，乌云满天，学校内部更是炸开了锅！何麟不顾打骂的威胁，及时到学生中去做思想工作，绝大部分学生都清醒了，不到两天时间，他们自己起来平息了这次风波。我们严防暗箭伤人，当时即护送三个湖南教师离校，并同时解聘了组织闹学潮的两个本地教师，白沙中学又算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政治风险，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学校内出了坏人就更危险！必须进一步组织好教师队伍，才能逐步实现我们的理想。

总之，在办学的三年中，我们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斗争，我们始终坚定地按照预期的愿望实行民主办学，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去闯新路，团结进步教师，培育青年学生，做一点踏实的工作，以便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因为我们坚定地相信共产党一定能胜利，一定能建设好中国。有理想，有希望，也就有勇气去冲破重重阻力，去争取我们的胜利。

红旗招展 奔赴革命

1947年3月，新四军皖西独立大队到白沙畈一带筹粮，主动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五月，以刘尚毅、杜林栖等同志为首的皖西独立大队来我校住宿了两晚，因为他们在大别山时听说白沙中学很进步，就分析过是不是有党的组织在领导？他们到校后，和全校教师见面交谈，了解办学情况，并大力

宣传了我党我军的大好形势。我们这些青年教师万分兴奋，真如失散多年的儿女见到了亲爱的妈妈，我们与部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提供图书资料以及代筹粮食等等。当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陆续解放了太、宿、潜等县城后，太湖县民主政府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何鹏被通知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白沙中学改为太学公学，培训革命工作干部，县长李英兼校长，何鹏任付校长，组织教学工作，我校绝大部分教职员都投入了公学的筹备工作，但九月下旬。蒋介石集结了三十多个师进剿大别山区，我军主动撤出县城，进山坚持游击战争。我校教职员中有个别同志要坚持白区工作，如谢礼昌湖南了；年老体衰的回家了，大部分同志参加了革命，其中有何鹏一家五人，还有教师蔡洲清、罗琼、罗陶、王济生、马有成、何文达一家四人，职员章镇南，校工韦义扬、王根旺，学生方秀江以及校董张小岐叔侄二人等共二十人集体参军，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斗争。后其中个别人因意志薄弱或年老多病而自动下山了，绝大部分同志都经受住艰苦斗争的考验，曾受到皖西军区领导的多次表扬。校工韦义扬同志在大别山的一次战斗中牺牲，更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48年12月，何鹏受命筹办安徽公学三分校。1949年春在太湖开学。这时白沙中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及全部教职员都参加了公学学习。太湖县中、太湖师范、六邑联中以及邻县的青年学生也都闻风而来。结业后，大部分学生留地方工作，一部份随军南下，近300名的青年学生为地方建设及解放大西南贡献了他们的力量，在革命的实践中成长为国家的建设人才。

太湖中学的变迁

太中党支部、校长办公室

太湖中学始建于1906年（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它的前身是太湖县熙湖书院。1905年，清朝正式废除科举制，第二年，太湖知县贾仕骏改熙湖书院为太湖县中学堂；民国元年又改为太湖县高等小学堂。从民元到抗战时期共毕业26期。其间，经过多次变迁，时办时辍，时聚时分，1942年才正式成立太湖县初级中学。1949年太湖解放，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安庆地委、安庆行署接管了由国民党政府和私人开设在太湖县内的三所中学——太湖县立初级中学、县立太湖师范、私立白沙中学，合并成立了“皖北区安庆第二中学”。1951年改名为“安徽省太湖中学”，直至今日。

解放前，太湖县立初级中学只有三个班，学生一百多人，教职员不超过三十人。学校没有自己的校舍，靠借用祠堂、教堂和私人房屋勉强上课，设备极其简陋。仪器、图书极少。其他两所学馆，情况也大致如此。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太湖中学的改造和建设。1950年拨出十万斤大米，维修伪县治（地址岔路口）作为校舍，并委派第一任县长李英同志兼任校长，亲自主管学校工作。由于学校刚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百废待举，当时只有学生一百多人（其中高中4个班，128人；初中三个班，67人），教职员26人。1954年，尽管华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安徽省人民委员会仍一次拨款239000元，在太湖县城北门街

建造新校舍7651平方米，1955年新校舍落成时，实际投资为352570元。这年十月三日，学校由岔路口迁入县城内新校舍上课，学生增至600多人，教职员近60人，增添了大批仪器和图书，师资力量还在逐步充实，教学秩序稳定，质量显著提高。1958年，全校共十八个班，学生增至903人，教职员73人。被上级定为地区重点中学。

朱克诚与太湖县熙湖单级师范学堂

朱家托

在太湖县教育史上，有一个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兴办新学、培训小学师资做过开拓性工作的人，他就是朱克诚。

朱克诚，字少迁。清朝同治五年（公元1867年）出生在北乡罗溪保（今太湖县石路乡陈湾村前进队二房屋），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染病，后因医治无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

朱克诚在清末两年一次的府试中曾中书科举，获庠生。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撰修的《朱氏宗谱》上记载：“邑庠生克诚少迁。”庠生即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原廪生员，每人每月皆由公家给粮食），其次是增生（有一定的名额），再次是附生，即新入学的。《太湖县志》第三册第35页上记载：“朱克诚，字少迁，附生，两江（指江苏、江西）优级师范学校毕业。”朱克诚在青年时代，曾背井离乡，不远千里，到两江优级师范学校（现南京师院附中）求学。该校是当时长江中下游诸省中的最高学府。巴金、鲁迅、关雅辉（前北师大校长）等都在两江师范求过学。朱克诚在求学期间学习用功，学业成绩较好，特别是熟谙日语。

十九世纪后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经济崩溃，农民群众革命化和各阶层人民反帝普遍加强的情

况下，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戊戌变法，一部分知识分子挣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认识到科举制度是愚民政策，它闭塞人的聪明，不能选拔真才实学的人才。当时各地新式学校纷纷成立，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般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大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家庭出身），深受社会动荡的刺激和农民群众革命形势的影响，因此，其中一些人就能够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中心吸取其曾经是革命和民主的有用部分，而使自己在当时革命潮流中，成为民主的革命的力量。一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积极兴办新式学堂，翻译外国书刊，介绍外国的科技成就。

朱克诚在南京两江师范求学期间，耳濡目染，开始醒悟，痛恨科举制度，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决心为传播文化科学知识而身体力行。《太湖县游学录叙》中这样描写朱克诚等在各处新式学堂肄业及毕业者的心境：“士生今日，上之不能谋生断国，与俾士麦克、伊藤博文比肩接迹，雄长欧亚；下之全伏闾里，不能如柰端、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之论，著书立说，发明新理，风靡一世，耻何如矣。”

“相率背乡里，别父母妻子，负笈担囊，不远数千里，以从事乎各直省奉诏建立之高等普通专门各学堂。”“艰苦卓绝，敦气谊，重礼义，不随习俗为转移。”“砥砺学业”，“增进其智识，匡益中国，为闾里增光，并一雪科学变相之言，不至与东西各国立学之意背而驰焉。”

开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洋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浪潮，也波及到地处大别山麓长河之滨的太湖县城。一九一一年，赵恩泽创办太湖熙湖单级师范学堂，并增设平民小学一所。熙湖单级师范学堂，又名太湖县单级教授教员养成所，设